

名人自述

主 编 方建文 张 编
二十世纪中国风云实录 (14)

线装书局

VIOLENT CHINESE HISTORY OF 20TH CENTURY IN CELEBRITIES' ACCOUNT

名人自述

第十四册

——二十世纪中国风云实录

目 录

第二十编 改革开放 (续)

拨乱反正

中央总书记为我雪沉冤	葛佩琦 (2)
可敬的师长	热 地 (16)
悼耀邦	李 锐 (22)

经济改革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邓小平 (28)
温州行	费孝通 (33)
一个“精灵”的出现	李 准 (55)
二十一个指印	从锡印 (69)

- 充分发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优势…………… 冯纪新 (74)
- 杀出一条血路来
- 深圳迈出第一步…………… 王从标 (81)
- 掀开珠海历史崭新一页…………… (93)
- 厦门特区
- 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胡少安 (102)
- 谷牧谈沿海经济开放…………… (108)
- 探索和发展的十年…………… 何椿霖 (114)
- 十年建设 十年飞跃
- 来自深圳经济特区的报告…………… 王 楚 (120)
- 回顾蛇口工业区六年的道路…………… 唐若昕 李福海 (125)
- 各界人士谈经济特区建设…………… 王全国 梁灵光等 (136)
- 改革产生了经济奇迹
- 布什赞扬中国的经济改革…………… (148)
- 中国改革前途光明…………… 李光耀 (150)
- 外国游客涌向中国…………… (155)
- 旅游业前景一片光明…………… (157)
- 各具特色的中国旅游胜地…………… (159)
- 西双版纳发展旅游业…………… (161)
- 中外游客云集的八达岭…………… 麦乐仁 (163)
- 北戴河海滩即景…………… (165)

西安郊区农民做外国游客的生意	(167)
饭店服务员职业深受女青年欢迎	二森和彦 (169)
使用信用卡促进了商业和旅游业发展	韦顿 (171)
北京，变革中的城市	伊·希门尼斯 (173)
北京社会秩序比纽约好得多	何艾历 (175)
踩河村——中国大地上绽开的鲜花	(177)
中国的再生巨人——上海	迈克·爱德华兹 (179)
今日上海	(203)
上海建设新经济区	加藤 (204)
在新的基础上建设上海	(206)
天津散记	刘米孝夫 (209)
迅速改变面貌的青岛、烟台	尾崎 (211)
东北地区现代化建设见闻	神田四郎 (215)
正在建设中的大连经济开发区	山本 (219)
鹤岗——生机勃勃的新兴煤城	山本展男 (221)
江苏——中国城乡的样板	霍塞波尼克 (224)
武汉小贩造了一幢楼	(231)
四川——中国改弦更张之地	罗·特里尔 (233)
重游重庆市 旧貌换新颜	白修德 (239)
充满生机的四川农村	华莱士 (241)
贵州省——变革正在进行中	科·麦克杜格尔 (243)

- 内蒙古的现代化之风…………… (246)
- 北部的贸易窗口二连浩特…………… 加藤千洋 (248)
- 开放政策的最前方——福建省…………… 户塚一雄 (251)
- 福建经济在发展…………… 弗·布雷韦蒂 (253)
- 海南岛繁荣起来了…………… (255)
- 世界屋脊面貌一新…………… 朱·威尔金森 (257)
- 变化中的西藏…………… (259)
- 现代化之风吹进西藏高原…………… 堀川健次郎 (260)
- 三十五周年：中国觉醒了么
…………… 阿兰·佩雷菲特 (263)
- 真正的历史性事件
——舒尔茨谈中国的经济改革…………… (274)
- 历史上最伟大的试验…………… 赫·施密特 (276)
- 改革，骨架有了，再添上些血肉…………… 阿兰·卡斯 (281)
- 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日益
巩固…………… 科林纳·麦克杜格尔 (286)
- 中国的改革重新塑造世界…………… 克里斯托弗 (289)
- 中国正处在激动人心的时刻…………… 恒安石 (292)
- 正在改变面貌的中国…………… 穆·扎曼 (298)
- 中国的变化…………… 戈斯波丁诺夫 (300)
- “我喜欢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 阿兰·胡 (302)

改革中的中国	贾·布阿塔 (309)
中国在走自己的路	法·图希 (312)
人民发挥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干劲	哈希 (314)
开放政策已站住了脚	朱·贝文 (317)
中国给非洲的启示	爱·沃尔夫 (319)
中国翻开了其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弗·戈德芒 (323)
前苏联报纸以赞许态度评论中国	
经济改革	安·罗森塔尔 (326)
中国正朝着幸福美好的方向发展	涅·津吉尔克兰 (328)
当前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谈中国的	
经济改革	若思 (332)
改革顺应世界潮流和中国民心	渡边长雄 (336)
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实验	小林实 (339)
中国巨大而虚弱的躯体重新站起来了	(343)
中国在很有章法地往前走	赫·奥普勒塔尔 (344)
一个经济强国登上了亚太经济区的	
舞台	增田祐司 (346)
十亿主顾——使人眼花缭乱的前景	(349)
改革是中国巨变的火车头	(352)
80 年代最有影响的事件发生在北京	(354)

- 巨变和发展中的中国经济 三好崇一 (356)
- 中国在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上前进
..... 里·雷恩 (358)
- 出乎预料的成就 布洛克 (361)
- 惊人的变化 伯·科赫 (363)
- 光明的大上海开发 守野友造 (366)
- 中国的挑战 沃尔登 (374)
- 世界大家庭中应受尊敬的成员 (377)
- 对中国改革持悲观态度的人都被证明
是错了 厄·福尔 (379)
- 从深圳看经济特区的意义 马克·贝克 (381)
- 中国的经济特区 B·阿尔希波夫 (384)
- 繁荣的南方 福特·沃西 (391)
- 南方的经济奇迹 关山太郎 (396)
- 将要腾飞的中国 赫尔穆特·施密特 (404)
- 中国的特区 罗·德托莱多 (408)
- 允许外国银行在特区设分行影响
深远 路透社 (411)
- 特区人 林淑荔 (413)
- 走上迅速发展道路的珠海特区 路·多罗萨里奥 (415)
- 访深圳经济特区 京·安德斯 (418)

正 反 乱 拨

“文化大革命”制造的冤狱和冤案多得数不胜数，上至共和国主席，下至平民百姓，从迫害致死到受批斗冲击，牵扯到上亿人。其中的血泪，闻之令人酸鼻。文革后，平反冤案与思想解放同步。

□ 葛佩琦

中央总书记为我雪沉冤

三中全会的英明决策给我指明方向

国家“宽大释放”了我，并且给了我公民权。我在社会上，应该和其他公民享有同样的政治待遇。但事实不然。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那种极端“唯成分论”流毒，我在政治上仍然受着歧视。例如，在我搬进交道口东大街96号大院之前，有关单位派干部，到那个大院做了安排。他们对老住户说：有一名“老右派”、“国民党少将”、“特赦释放的犯人”，要搬到那间小空房里住；你们要提高警惕，划清界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种政治压力，使我如重负在肩，喘不过气来。

1978年4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11号文件。其中宣布：“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右派分子”固然感到高兴；但这些人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并没有得到改善。例如我本人每月仍然只拿18元生活费，不能恢复工资待遇。社会上的人士对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有人说：右派问题是个实质，不肯定是否划错了，只是搞掉帽子，并不能改变其实质，所以他们把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叫做“摘帽右派”。

1978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1978〕55号文件。其中宣布对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予以改正的政策。这是一个彻底解决“右派分子”问题的重要文件，使我受到鼓舞。我决心根据党中央的这个政策，争取改正错划我为“右派分子”的决定。找谁改正呢？问题是中国人民大学搞错的，我当然要先去找中国人民大学。我第一次往访中国人民大学，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不得已，我去拜访成仿吾校长。成老询问了我的情况，并说：我把你的报告转给人事处。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刚刚复校，正在从各方面向回调人。我想我的“右派”问题和工作问题，可能同时得到解决。

过了几天我到人事处去询问处理结果。一位干部回答说：你的报告转来了，但成校长没有在上面批一个字，我们无法处理。我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1978年12月22日，报纸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其中决定：对冤假错案采取“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予以平反。学习了这个文件，

我精神振奋！我决定依据这一英明方针，上访中央组织部，请求恢复我的党籍，平反我的冤案、错案。

上访中央组织部

12月25日，我到中央组织部信访处接待站上访。那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上访队伍。我领登记表时，干部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葛佩琦。立刻有几位上访人员围拢上来，问长问短。有一个人说：没想到你还在人间！干部发给我一张登记表和一个接谈号码。按这个号码，我须等到第三天，才能被接待谈话。有一位上访人员对我说：我的号码一会儿就可接谈，咱俩换一换号码，你先去接谈。我以十分感激的心情，和他换了接谈号码。当干部收到这个号码时，我把号码和我填好了的登记表一同交给了干部。干部看了看登记表，并问：你是1957年的葛佩琦吗？我说：是。他说：你先到外面等一等。我心中有些嘀咕：我这个1957年的“右派”，到处受歧视，难道上访也受歧视吗？过了一会儿，那位干部又叫我进屋。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旁边的上访人员有些奇怪，他们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指派到后门（信访处）接见，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有人接话茬说：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

我到了中央组织部前门传达室。这是两间座北向南的房子，光线充足，室内清雅，东头摆着一张办公桌，周围摆着沙发椅子。传达室的同志和颜悦色，彬彬有礼，让我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她一面请我坐下，一面打电话。约有10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干部，请我到了会客室。先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问了我的住处和简单情况。她说：“领导接见你，但今天领导开会去了；请你后天（12月27日）上午来吧。”

12月27日上午8点，我到了中央组织部。经过电话联系，王子冀同志接我到了楼上会客室。他说：宣教下部郝局长接见你。等候片刻，郝局长来到会客室。他一进门就和我热烈握手，并称呼我为“葛佩琦同志”。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听到干部称呼我为“同志”，我心情激动，感到温暖！唤起了我作为共产党员的光荣感！因为在监狱被关押的人，不准称呼“同志”。偶而不慎，称呼“同志”是要受到批评的。今天来到党中央组织部，获得如此荣誉称呼，我感到这是对我的政治关怀，解除了我多年由于在政治上受压抑，形成的自卑感。

郝局长询问了我是怎样出狱的和回到北京的情况之后，他说：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怀，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我陈述了我的历史经历和蒙冤情况之后，提出三点请求：1. 请‘求恢复我的党组织关系；2. 请求改正错划我为“右派”的决定；3. 请求彻底为我平反冤案。郝局长说：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写给我一份材料，我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予以处理。他并说：你最好先

要求改正错划右派，因为不改正错划右派不能恢复党籍。我又问：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无人提出异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郝局长说：这个问题也要去问人民大学。过了 1979 年元月不久，我将写好的材料送给了中央组织部郝局长。

1979 年 4 月初，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询问对于我的“右派”问题的处理。见到了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他说：中央组织部已经转来了你的申诉材料，我们正在进行复查。我告诉他：1957 年 5 月 27 日《人大周报》登出了我的“发言”，歪曲了我发言的原意，我当即向常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聂真同志接见的我。同年 6 月 8 日《人民日报》刊登出的我的那个“发言”，与我的原发言完全不相符。我于 6 月 9 日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予以更正。按中央宣布的政策，我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他说：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1979 年 11 月 12 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派人给我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由于根据的仍是 1957 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因此《复查结论》还是说我“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我当即表示：我不同意这个“复查结论”，我要继续申诉。

第二天我拿着那个“复查结论”和 1957 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我的那个“发言”，到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律师

问我：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你是否在报纸要发表的那个稿子上签过字？我说：报纸上刊登我的那个“发言”之前，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没有见过那个稿子，当然我也没有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报》登出的那个“发言”之后，我立即到人民大学党委会作了更正，有人证可查。然后那位律师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沒法律效力的，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主据。你更正过的“言论”，不应作为处分你的依据。

依据北京市法律顾问处的答复，我又开始了新一轮上访和申诉。当时在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解决右派问题的部门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公安部等五个部。我多次上访各有关部门并向各部门领导写申诉。各部门接待的人员都说：“复查结论”已经有关方面批准，我们不便过问了。有人的表示：阻力太大，爱莫能助。经过几个月的上访，我跑遍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没有任何效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好心的亲友也劝我说：官高一级压死人，不要白费力气了。但我坚决相信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我决心开始第三轮上访和申诉。我第三次轮流上访有关各部门，到了中央组织部，一位年轻而有政策水平的接待同志对我说：你的问题已经定型了，没有中央指示，难以起死回生。这是对我的一点重要启示。

上访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我到胡耀邦同志家中上访。（关于这次上访的详细经过，在拙作《总书记批阅的第二千零一封人民来信》〔1985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作了叙述。为了联系上下文，在此只作简单介绍。）他的家住在北京东城的一个胡同，胡同里没有便衣巡逻，大门口没有武装警卫。红漆大门上有个电铃，我一按电铃，出来一位警卫员。他问我找谁？我说：我来拜访胡总书记。他转身就回去了。接着出来一位干部，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向他通报了姓名和说明来意。他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带着材料吗？”我说：“带着。”我就把一封约500字的申诉信交给了他。他说：耀邦同志正在会客，没有时间接见你。今晚我一定把材料代你转上去，明天下午5点，你来看处理情况。

次日下午我按时前往。一按电铃，那位干部出来了，他交给我一个印着红框的大信封。并说：你拿着它到中央组织部去见陈野萍副部长。时近黄昏，我的眼睛有些看不清了。我拿着信封转回家，在电灯下一看，信封是用红铅笔竖写的：左边写的是中组部；中间写的是陈野萍副部长；右边是胡耀邦签字。我打开信封一看，耀邦同志在我的申诉信上作了指示。

第二天上午我拿着耀邦同志的指示，到了中央组织部。陈

副部长的秘书任小彬同志接见了。他说：陈副部长到中央书记处开会去了，你的问题如何解决，待陈副部长决定。任秘书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并说：有事电话联系。过了两天我打电话给任秘书。他说：陈副部长已指定专人接见你，并确定了接见的时间和地点。我按时前往，见到中审局的一位局级领导。他说：中国人民大学的“复查结论”认为“划你为右派分子不属错划”，你为什么不同意？我说：人民大学的这个“复查结论”是以1957年报纸上刊登那些对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为依据得出来的，那些话不是我说的，报纸在刊登之前，没有以我签字同意，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根据没有法律效力的话作出的“复查结论”，我当然不同意。那位领导又问：你说你没有说那些话，你有什么证据？我说：我有人证和书证。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登出那些话之后，我就到人民大学党委作了更正。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聂真同志接见的我。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出那些诬陷我的话，6月9日我就写信给人民日报社要求予以更正。那位领导最后说：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们指示有关方面重新复查，查出来的材料和你见面。

1980年7月下旬，中国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让我看了复查出来的材料，其中就有1957年6月9日我写给人民日报社的那封更正信。我将那封更正信抄录下来，分别寄给了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等有关单位。关于我的错划右派改正问题，又提上了有关单位的议事日程。